

## 沈志华的《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

（中文）香港，2000年

Л. П. 杰柳辛（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学院历史学博士）

中国史学家沈志华，长久以来一直在很有成效地研究中苏关系的各种问题。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中，他努力追求用新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那些对中苏合作和互助的性质有影响的最重要的事件。他的作品为理解1950-1953年朝鲜战争发生的原因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沈志华依据档案材料，以及俄罗斯学术杂志所发表的资料，尤其是《近现代史》和《远东问题》杂志，对中苏之间友好军事政治同盟形成时期双方的政策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在香港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1948-1953》中，向读者介绍了那些由两国领导人讨论并解决的首先是经济相互关系范围内的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沈志华利用具体资料表明了中苏同盟形成的过程，以及那些影响参加谈判人员首先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行为的因素，两国相互关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私人关系的性质。似乎两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忠诚的本身，注定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中苏之间合作的必然性。但是，作者所分析的资料表明，是何种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障碍，以及何种经济利益对寻求和制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军事政治同盟和经济互助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在著作的第一章里，分析和研究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国内战争的的决定性阶段，苏联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作者表明，在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援助的同时，当时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了条约并负有义务的莫斯科，所遵循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接近的意图。

根据作者的看法，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在远东所遵循的战略目的是：第一，保持蒙古独立于中国；第二，在东北地区恢复苏联在沙皇俄国时期就拥有的地位。在取得对日胜利之后的最初阶段，斯大林努力追求与美国继续保持合作。在形式上并不破坏雅尔塔协定和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条约的情况下，苏联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共产党抗击国民党，尽管斯大林也承认，他并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够取得胜利。把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拖延从满洲地区撤出苏联军队，这给共产党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苏联竭力利用这些共产党人的力量来削弱美国和国民党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地位。作者还援引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的关于他们对苏联这个政策理解的那些发言。

在强调苏联的援助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地位的重要意义时，作者指出，与此同时，苏联也为自己获得了经济利益，尤其是在使用中国长春铁路方面。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越来越明朗化，苏联也扩大了自己的援助。苏联调整铁路工作的专家们，修复了桥梁，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运来了货车，以此加快从满洲向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推进的速度。尽管这些支持不是官方的，因为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仍具有重大的意义。1949年上半年，我在哈尔滨进行实习，亲眼看到了我们的铁路工人、筑路和架桥工人是怎样地忘我劳动的，他们准备为共产党人获得胜利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谈到这些内容时，作者没有回避当时出现在两国之间的那些困难和矛盾，但是，它们并没有降低苏联援助的意义。

在1949年初，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作已经获得了国家性质。为了明确未来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方式，苏方派阿·伊·米高扬前往中国。米高扬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并

制定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1949年6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并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果是派一大批专家前往中国。专家们的任务是：在技术上帮助中国新政权恢复国内战争时期被破坏的工厂、运输和通讯设施。

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立即正式对它表示承认，这进一步发展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这要求两国之间签署新的条约，因为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条约已经失效。带着这一目的，毛泽东于1949年12月来到了莫斯科。沈志华在其著作中讲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判过程，并强调了它们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保存在档案馆里的会谈记录，以及A. M. 列多夫斯基和С. И. 齐赫文斯基公布的资料，中国史学家描述了谈判极其复杂的情景，并表明：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同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签署一个新的条约，以取代斯大林同蒋介石政府签署的旧条约的建议。斯大林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时苏联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正式签署。在作者看来，斯大林同意让步，不仅仅是因为，中苏双方在原则上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阻止它的侵略活动。双方的共同任务是巩固反帝斗争阵线。但是，在涉及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方面，还存在着分歧，国民党分子曾经坚持蒙古回归到中国的组成中，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希望的。

中国代表同意了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答应今后不再提出蒙古的问题使斯大林得到了安慰。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人承认了苏联在新疆和满洲地区的特殊利益，尽管不是以直接的方式。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中国加入了以莫斯科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点斯大林也考虑到了。

对斯大林和毛泽东莫斯科会谈的分析进行了总结，沈志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条约确保了两国之间同盟和友好关系的发展，而实际上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仿佛并没有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作者指出，后来，在1958-1959年毛泽东曾经向赫鲁晓夫谈到，他是被迫承认满洲和新疆是苏联的“殖民地”的。

沈志华还写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保留了一丝阴影，但是朝鲜战争降低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不信任程度。朝鲜战争有助于中苏同盟的巩固，并促进了作为这种同盟基础的经济合作的发展。

在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采用了各种方法，对苏联在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给中国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进行了研究。本书的第三章就是这样的内容。作者高度评价了苏联援助的意义，并描写了中国对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依存性。这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落后的国家，还因为，中国当时不可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援助。作者指出，在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与驻华和莫斯科的苏联代表会谈时，经常强调说，他们的许多都应该归功于苏联的援助，同时力争扩大这种援助。

作者详细地描写了这些援助的方式，如：提供低息贷款，同时暗示到，如果苏联没有用垄断购买如钨矿、锑、锡和锌这些战略原料的要求来约束的话，那么这些援助将会更有分量。给中国贷款的一部分用于购买了军事技术。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和改造旧的工业企业也是苏联援助的重要方式。列举了在苏联帮助下建成的工业设施，作者写到，正是这些工业设施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多次声明过，作者还将他们的发言列入其中。

作者肯定性地评价了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双方从中都获得了益处。他还指出了联合公司，尤其是新疆地区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建立石油和有色金属联合公司的协定，被西方报刊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评价为：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驳斥了上述评价，作者描写

了联合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民族经济的事业中，所起到的那种特别有益的作用。

作者在著作中还指出，向中国派出大批苏联专家也具有不小的意义。中国领导人为苏联的工程师、经济师、律师和教师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这些苏联人以忘我的精神帮助中国朋友。

沈志华还描写了伴随着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些困难、矛盾和误解，并说明，有时的磨擦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总的来说，他的结论是：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和巩固具有巨大的意义。尽管这种援助无法解决新中国所碰到的全部问题，但它仍然是富有成效和慷慨的，这种援助有助于中国的安全，并为其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译自《近现代史》2001年第2期第199-201页。